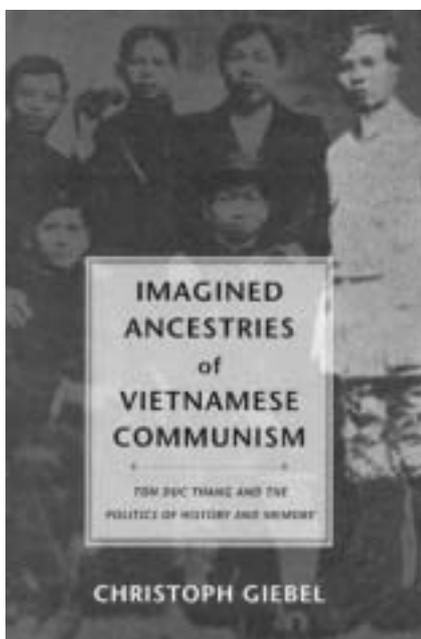


歷史記憶與政治神話： 評《越南共產主義的想像世系》

● 黎漢基



Christoph Giebel, *Imagined Ancestries of Vietnamese Communism: Ton Duc Thang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and Memory* (Seattle and London: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, 2004).

人們提及越南共產主義的起源，很容易便想到它的民族主義背景。在越共宣傳機器的引導下，胡志明以「阮愛國」之名出席巴黎和

會、爭取民族權益等傳奇事迹，已經深入人心；「胡志明＝越共＝愛國」的思考方程式，佐之以抗日、抗法、抗美、抗中等事例，不只讓自己人深信，也感染了意志力薄弱的敵人。自越戰以來，美國社會都在嘆恨華盛頓當局忽略越南人對外抗敵的歷史傳統，以致低估越共游戰隊的耐戰能力。於是，越南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二而為一，成為美英學術界的主流論述；相對來說，很少學者探究越共與國際主義的關連。

越南是一個小國，革命經歷之艱辛，比中共尤有過之。如所周知，在共產陣營中過份強調自身民族的利益立場，很容易導致猜忌和批判；對於仰賴蘇聯和中共兩位「老大哥」援助的越共來說，這更是不容擦槍走火的關鍵大事。事實上，越共在對外宣傳上對國際主義的重視，殊非外人所能設想。作為國際主義的代表人物孫德勝 (Ton Duc Thang)，其在越南革命中所發揮的象徵功能，正是《越南共產主義的想像世系》 (*Imagined Ancestries of Vietnamese Communism: Ton Duc Thang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and*

在共產陣營中過份強調自身民族的利益立場，很容易導致猜忌和批判；對於仰賴蘇聯和中共兩位「老大哥」援助的越共來說，這更是關鍵大事。事實上，越共在對外宣傳上對國際主義的重視，殊非外人所能設想。孫德勝正是國際主義的代表人物。

孫德勝能夠給與越共一個身份認同，這是其他人無法提供的。孫德勝的身份和形象非常特殊，把他放在公眾矚目的位置，是為了在國內和國外為越共政權爭取最大程度的支持。

Memory，引用只註頁碼)一書作者吉貝爾(Christoph Giebel)再三著墨的主旨。

孫德勝是何許人也？這個問題或許問倒了許多不熟悉越南歷史的學者。自1946年3月擔任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席起，孫德勝在公開場合中就是僅次於胡志明的第二號人物：北越建立後，擔任國家副主席；胡志明去世後，繼任國家主席。雖然位居顯要，但他的實權卻遠不能跟長征、范文同、黎筭等人相比。包括國家主席在內，他所擔任的幾乎都是有名無實的榮譽職務：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主席、越南國民聯合戰線全國委員會主席、越南勞工總會終身榮譽主席、越蘇友好協會主席、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、捍衛世界和平越南委員會終身榮譽主席……唯一算得上是實務職務，只是在1947年4至10月暫時代理內政部長。

為甚麼這樣一個顯著的政治人物卻缺乏實權？因為被法國人關禁逾十六年之久(1929.7-1945.9)，孫德勝在越共內部一直難有積蓄人脈資本的機會。既然缺乏政治實力，為甚麼他又可以居於最顯貴的位置？須知道，孫德勝是出生於湄公河下流龍川市郊的南方人，而河內政權基本上是北方人的天下！

作者的答案是：孫德勝能夠給與越共一個身份認同(identity)，這是其他人無法提供的(頁xviii)。在越共領導層中，他和胡志明是僅有的兩人生於1900年之前，具有足夠的年資可以充當保護民族的國父型人物。從象徵的功能來說，胡、孫二人高度互補：胡來自中北部，而

孫來自南部；胡具有參與國際革命的最長紀錄，孫具有被法國人囚禁的最長紀錄；胡是活動型人物，孫是烈士型人物；胡是知識份子，孫是勞工；胡代表革命政府計劃、決策和執行的聲音，孫代表人民群眾付出、批准和支持的聲音；胡是領導者的領袖，孫是支持者的領袖(頁40)。簡而言之，孫德勝的身份和形象非常特殊，把他放在公眾矚目的位置，是為了在國內和國外為越共政權爭取最大程度的支持。

越共這種做法，其實並不罕見。自中共建國以來，為了凸顯「人民政府」的廣泛代表性，就把許多只有風光歷史、卻已喪失權柄的社會賢達「包了下來」。孫德勝與眾不同之處，在於他具有感動人心的革命傳說。作者指出，孫德勝早年有三件為人津津樂道的事迹：1、1919年俄國內戰期間，在黑海參與法國海軍兵變；2、1920年代初，在西貢組織「秘密工會」，這被視為越南第一個工會；3、1925年，他的「秘密工會」在巴山(Ba Son)兵工廠領導罷工，這被視為越南第一次政治性罷工。

以上三個故事，最富傳奇色彩和最重要的肯定是第一個，也是全書的主軸。故事大概是這樣的：十月革命爆發後，帝國主義國家聯合出兵支持俄羅斯國內的白軍，孫德勝是法國海軍艦上的一名水手。1919年，當軍艦行駛到黑海北岸城市史瓦斯托普(Stevastopol)時，他與法國水手一起譁變，威脅法軍軍官回國，不然就把軍艦獻給紅軍。結果法國的軍事干預中止，而黑海兵變也無形中保護了布爾什維克免

受法軍攻擊。據流行的說法，孫德勝是兵變的幕後主謀，他在事發前曾接觸並鼓動後來因兵變而被起訴的法國工程師馬蒂 (Andrè Marty)。更富戲劇意味的是，孫德勝當時在艦上豎起紅旗，昭示嚮往蘇維埃的心志。紅旗在黑海飄揚的感人場面，很容易令人聯想到蘇聯著名電影《波坦金戰艦》(BattleShip Potemkin) 的情節；該劇提及沙皇海軍艦隊的士兵拒絕向自己的兄弟開炮，於是水兵瓦庫林楚克登上炮塔，振臂高呼，宣布起義，佔領戰艦，升起了革命的紅旗，駛向大海。

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，國際主義就萎靡不振，因為戰爭見證着不同國家的無產階級「弟兄」相互殘殺的殘酷事實。對於大多數左派來說，黑海兵變乃是復活國際主義精神的英雄事件，因為來自不同國家的工人超越國界，以實際行動共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蘇維埃。按照斯大林的說法，「誰決心絕對地、毫不動搖地、無條件地捍衛蘇聯，誰就是國際主義者，因為蘇聯是世界革命運動的基地，不捍衛蘇聯，就不能捍衛並推進世界革命運動」^①。本書沒有引錄這段話語，但它很能說明黑海兵變何以被視為體現國際主義的史詩式壯舉。就目前所知，東方人參與十月革命者寥若晨星，詎料越共通過孫德勝卻與之扯上關係，難怪越共黨員莫不與有榮焉。

在作者看來，這樣的歷史關係不過是「想像的世系」(imagined ancestries)，缺乏事實的根據。他顯然不認為國際主義是觀察黑海兵變的適合視角，他指出因為西方國家的軍事干預沒有事先宣戰，目標

不清，而士兵厭戰，渴望回家，才是引起海軍譁變的主因。因此，他支持馬森 (Philippe Masson) 的說法，認為整個事件更像是罷工而非兵變 (頁9)。更成問題的是，遍查法國海軍保留的艦隊水手登船紀錄，都查不到孫德勝的紀錄；甚至在進行黑海任務期間，所有艦隻也找不到越南水手的紀錄。於是，作者斷定孫德勝當時不在爆發主要事件的船上，事前事後都沒有接觸過馬蒂，所以他肯定沒有參與史瓦斯托普的兵變事件 (頁11-14)。這個推論相當有力，除非能找到水手登記不全面，或者孫德勝不透過登記而在船上的確切證據，不然的話，人們惟有接受孫德勝無涉兵變的結論。

如果說孫德勝沒有直接參與兵變，為甚麼他對其中的故事這麼稔熟？後來不少與他共事的同志都指出他對兵變過程頗為了解。作者提出一個相當大膽的推測：孫德勝參與的並非黑海兵變，而是繼此之後的土倫 (Toulon) 群眾運動 (頁24-25)。位於法國南部港口的土倫是一座赤色城市，當地左派工會力量龐大，隨着1919年5月黑海兵變的消息傳到當地，城內開始出現不少騷動，港口、兵工廠成為群眾示威、罷工、衝突的據點。通過這些政治參與，孫德勝不只對兵變和馬蒂的故事瞭若指掌，而且培養出左派政治意識。相信是由於資料有限，作者沒能提出直接的證據，但以上觀點仍有一定的說服力，因為現在找不到黑海兵變時孫德勝在軍艦上的證據，也找不到他離開土倫到軍艦工作的資料。

黑海兵變原是孫德勝自己的故事，但隨着政治需要，卻演變成越共的故事。作者指出，孫德勝最初講述這個故事，很可能是出於爭取年輕工人支持的政治需要，而黑海兵變故事也成為越盟宣傳的好題材。

以前黑海兵變故事都沒有提及孫德勝升起紅旗，但在1951年以後卻加入這段情節。作者猜測這可能與當時越共取消越盟、創建勞動黨有關；透過升起紅旗的情節，可以凸顯越共擁護共產主義的形象。

不論真假，黑海兵變原是孫德勝自己的故事，但隨着政治需要，卻演變成越共的故事。這是本書寫得最引人入勝的一大亮點。作者指出，孫德勝最初講述這個故事，很可能不是為了自吹自擂，而是出於爭取年輕工人支持的政治需要（頁29-30）。自從成為越南民主共和國國會副主席後，孫德勝的公開曝光率大幅上升，而黑海兵變故事也成為越盟宣傳的好題材。例如在1946年4至5月間，孫德勝帶領代表團訪問法國，他與法共高級幹部馬蒂會晤時的擁抱和親吻，就被渲染為兩個黑海老戰友的重逢（頁45-47）。到了1947年11月武涯會議之後，被法軍趕入山區的越盟亟欲突破孤立無援的困境，遂檢討過去把黨隱藏起來的做法。為了爭取蘇聯和法共的支援，越共有必要消除1945年八月革命是民族革命而非共產革命的不良印象，於是孫德勝的黑海故事在1947至1949年間成為胡志明政權對外宣傳的重點題材，因為這個故事富有蘇聯欣賞的國際主義精神，可以藉此拉近八月革命與十月革命之間的歷史關係（頁56-58）。

事實證明越共的對外宣傳是奏效的。當1951年5月孫德勝到北京進行官式訪問時，在晚宴前中共忽然接到從克里姆林宮的來電。斯大林在電話中要求，第一杯祝酒由蘇共中央委員會和蘇聯國家敬給孫德勝，以表揚這位黑海老戰士。作者猜測，斯大林實際上是對越共國際主義的高度表揚：由於孫德勝的黑海故事在時間上比中共革命要早，也更富國際主義的無私精神；這隱含中共也有向親蘇的越共學習的必要，無形中損貶了毛澤東的革命路

線（頁60-61）。這一說法是否成立，暫時難下定論。評者認為斯大林即使有此想法，也不應過份誇大其中的意義，因為抗法期間師法中共，早已是越共的最高施政方針，目前似乎沒有證據可以說明蘇聯對此有何干擾和支配的傾向。

不管如何，斯大林的來電已為黑海故事賦予無可質疑的權威，而孫德勝也屢次得到莫斯科頒授最高級別的勳章（頁62、84）。隨着故事愈來愈廣為人知，聽眾也要求知道更詳盡的情節。以前黑海兵變故事都沒有提及孫德勝升起紅旗，但在1951年以後卻加入這段情節，而且很快成為故事的核心內容。作者猜測，這可能是與當時越共取消越盟、創建勞動黨有關；透過升起紅旗的情節，可以凸顯越共擁護共產主義的形象（頁64-66）。

但是，這也給孫德勝帶來很大的麻煩。當時豎起紅旗的法國軍艦只有三隻，而且全是停在史瓦斯托普，如果按照故事的原來版本，孫德勝只屬眾多起義船員的其中一人，那麼別人要查證還很困難；但如果按照升旗的新版本，孫德勝要冒認自己做過這麼矚目的行為，便太容易惹起別人的懷疑和爭議。所以孫德勝在1957年撰寫回憶文字時，為了彌補故事中的破綻，不得不改動故事的事發地點，表示自己所在的艦隻並非位於史瓦斯托普，而是位於君士坦丁堡附近的海峽；這等於間接承認，自己沒有直接參與兵變，而升紅旗只是遙遠的致意（頁66-75）。

如此一來，孫德勝雖然逃過別人的查證，卻削弱了自己原來在兵變中的角色；但由於信者恆信，所

以黑海兵變的故事也就帶着明顯的漏洞傳述下去(頁80-84)。孫德勝的黑海故事，由小謊變成大謊，為了圓謊而左支右絀，但究竟不能逃避作者的查證；這樣弔詭性的發展過程，予人不少值得深思的啟示。

本書另一件着墨較多的事件是1925年8月發生的西貢巴山罷工事件。越南學者陳文酉(Tran Van Giau)在1961年出版的《越南工人階級》(*Giai cap cong nhan Viet Nam*)一書中，根據孫德勝在1957年的訪談紀錄和某些報刊的記載，指出這次罷工是由孫德勝領導的「秘密工會」在背後發動的；它不只是越南第一次由工會組織、具有政治目標的罷工，而且是第一次體現着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罷工。書中聲稱，這次罷工與當時摩洛哥、敘利亞等殖民地抗爭一樣，是為了反抗法國帝國主義的偉大門爭。它的目標是針對五卅事件後的中國革命形勢，為了阻擋帝國主義者在遠東結集軍力，所以巴山兵工廠的工人趁法國軍艦Jules Michelet來到西貢進行修理之際，發動罷工拖延其行程，使之無法駛到中國鎮壓工人運動。

據作者的考證所得，從政治鬥爭的角度來觀察巴山罷工，與當時西貢右派報紙的政治陰謀論一樣，都是存在着認識上的嚴重缺陷。作者對比當時西貢各大法文報紙的內容，發現*L'Indochine*、*L'Impartial*、*L'Écho annamite*、*Progrès annamite*、*L'Avenir du Tonkin*等報刊各有政治立場，所以它們的報導各有偏頗，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歷史的實錄。通過這些報導與法國殖民政府檔案的比較，作者發現罷工的成因絕非國

際主義的政治目標，而是因為薪水的制度安排。以前，該廠工人提早半小時下班領取薪金，自1925年7月起，管理層要求工人只能提早十五分鐘下班，工人為此大感不滿；加上先前工廠因停電而停工，廠方無理剋扣工人薪金，於是，全體勞工自8月5日起拒絕上班。而廠方也態度強硬，不惜玉石俱焚，威脅從此關閉工廠。經過工人代表與管理層雙方斡旋，工廠重開，全體工人在最後限期前返廠上班。期間，工人只是罷工，既沒有示威，也沒有提出正式要求。更重要的是，罷工沒有影響軍艦Jules Michelet的航程，它停在西貢是因為機械故障問題，而它的修理時間也比計劃預期中更早(頁93-119)。由此證明，孫德勝所說的政治性罷工，完全背離實際，不足採信。

令人納罕的是，同樣是體現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事件，巴山罷工完全不能與黑海兵變相提並論，而且在越南國內存在極大的爭議。如果翻閱中譯陳輝燎(Tran Huy Lieu)《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》(*Lich su tam muoi nam chong Phap*)一書，就會發現全書無一語提及孫德勝的功績，而且對1920年代越南工人運動的評價甚低：「這些孤立的暴動只是帶着個人的自發性質，常常帶來惡果，而不是革命的一個鬥爭形式。」^②為甚麼孫德勝的「秘密工會」和巴山罷工得不到廣泛的肯定和宣揚？作者估計，這是因為越共中央集權的統治壓抑所致，因為越共官方強調越南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，是由工人階級先鋒政黨建立工會，組織、教育、動員工人(頁132-34)；

據作者的考證所得，從政治鬥爭的角度來觀察巴山罷工，存在着認識上的嚴重缺陷。作者對比當時西貢各大法文報紙的內容，發現報刊各有政治立場，報導各有偏頗，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歷史的實錄。

在越南，因為法國殖民統治力量強橫，越共鮮有高層領導沒有被捕下獄的經歷。孫德勝之所以成為越共的傳奇人物，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背景是他的牢獄生涯最長。卒讀全書，作者對這方面的內容記述甚少。

作者認為高壓統治反而導致地方主義的出現。自1975年越南統一以來，許多南方人感到被打壓和被出賣，南方人的地方意識又再抬頭，而孫德勝的「秘密工會」和巴山罷工便成為許多南方人借題發揮的對象。作者嘗試以自己在1988年親身參與孫德勝百歲壽辰學術紀念會議的見聞，來證明其中的分歧（頁136-46）。

就這個問題，作者所提出的論證似乎不能教人釋疑。無可否認，越南存在地方主義的獨立思想，但這跟是否承認孫德勝的「秘密工會」和巴山罷工，卻不一定是直接的因果關係。一般人總是容易相信來自遠方的傳說。黑海兵變故事在越南國內無典可查，易於接受是可以理解的；相反，西貢的工人運動史卻是越南學者可以就近研究的課題，自然不易輕信孫德勝的說法。正如作者的研究所示，巴山罷工根本談不上是有組織、有意義的政治鬥爭，而越南歷史學者諸如鄧和(Dang Hoa)、杜光雄(Do Quang Hung)、范藍(Pham Xanh)等人也告訴作者，所謂「秘密工會」不過是社會俱樂部的性質（頁145-46）。因此，孫德勝在西貢領導工會的成就之所以一直存在爭論，很可能是歷史學者對事實材料的嚴謹態度所致，作者將之定位為打壓地方主義的背景，未必是中肯的說法。

本書共分三部分。黑海兵變和西貢工會罷工分別佔據第一部「建構」(Constructions)和第二部「爭議」(Contestations)的主要內容，佔全書正文四分之三的篇幅。最後一部名為「紀念」(Commemorations)，描

述紀念孫德勝的兩種不同取向。先是描述孫德勝在1980年逝世後越共中央如何在國家困難的環境中，把孫德勝描述為官方的革命民族英雄。然後說明越南隨着1980年代中晚期以後，經歷市場改革等變故，南方紀念孫德勝的懷舊活動也變成對國家政治發展的批判工具。這部分的內容像是故事的尾聲，但寫得有點拖泥帶水，可讀性不如前兩部之高。例如，對「假、大、空」的官修傳記《孫德勝同志》(*Dong chi Ton Duc Thang*)一書的介紹便與書中先前部分有重複之處，讀來頗感乏味（頁149-66）。又如在說明孫德勝紀念活動時，上溯到越南古代的民族英雄事迹，對生於中國明朝的阮廌(Nguyen Trai)着墨尤多，這不免令讀者感到有點離題萬丈（頁173-82）。評者以為，如果把第三部的內容適度地濃縮，也許效果更佳。

除此之外，作者既然已經花了那麼多篇幅說明黑海兵變和巴山罷工等事迹，讓我們認識故事傳說與歷史真實之間的差距，為甚麼不多說明孫德勝在崑崙島身陷囹圄的經歷？孫德勝之所以成為傳奇人物，原因之一是他在法國殖民期間坐牢時期最長的共黨領袖。對於牢獄生涯，越共與中共有着不同的認知和判斷。中共建國後，過去黨員在「白區」的牢獄經歷，常是成為叛徒的罪證；但在越南，因為法國殖民統治力量強橫，越共鮮有高層領導沒有被捕下獄的經歷，甚至有人認為吃牢飯是越共領袖履歷中最重要資格。孫德勝之所以成為越共的傳奇人物，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背景是他的牢獄生涯最長，是其中一個

為革命犧牲最多的苦行僧型的人物。卒讀全書，作者對這方面的內容記述少得可憐；我們只知道孫德勝在獄中仍在講黑海兵變的故事（頁28-29），只知道孫德勝以正面的眼光看待他的牢獄生活（頁163-64）。

另一處值得留意的是，孫德勝之所以被法國人拘捕，是因為「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」內部的桃色糾紛。傳聞當時他（或某名黨員）與高幹黎文發（Le Van Phat）為了爭奪女同志陳秋翠（Tran Thu Thuy），私自處死黎文發，因而被殖民地警察有機可乘，藉此捉拿孫德勝等人，並摧毀當地的革命組織。作者雖然簡略提及此事（頁xv-xvii、159-61），但相信很多讀者和評者一樣，都想追問這一事件何以沒有成為孫德勝形象建構的負面因素？按理說，孫德勝應該為西貢革命活動的失敗負上無可推卸的責任，但為甚麼這樣的經歷對他毫無損傷？掩卷之後，依舊不知道其中的奧秘是甚麼。

此外，書中還有幾個值得提出來討論的地方。首先，在作者眼中，孫德勝是越共典型的「樣板人物」，但究竟他在1945年出獄後負責過游擊戰工作，而且又是著名的南方革命家，所以他在越盟中不是無可非議的人物。至少，1947年初越盟改組內閣，他便因為形象問題而不得續任內政部長^③。在這方面，作者似乎欠缺一個平衡的敘述。

其次，作者指出1947年武涯會議後，越共全面對外宣揚黑海兵變的事跡，但是武涯會議其實只是一次紀念十月革命的非正式集會，作者所根據的史料也只有孫德勝女婿楊文福（Duong Van Phuc）的口述紀

錄（頁3-4）。究竟武涯會議如何轉化為越共的宣傳工作任務？越共究竟是透過甚麼宣傳渠道，足以影響蘇聯和法共的視聽，以致連斯大林也接受黑海兵變的故事？評者認為這些都不是無關重要的問題，因為歷史記憶的政治操作是本書的宗旨所在。可是，作者對越共的宣傳出版政策卻沒有應有的分析和介紹。

再次，作者再三聲言，巴山罷工故事的出現，是因為孫德勝自1957年為黑海兵變圓謊後感到挫折，希望有另一個故事證明自己的革命性（頁84、134-35）。然而，這個猜測沒有任何旁證，似乎太過武斷。

儘管存在若干問題，實際上並不損及本書的價值，特別是作者考證史料的功力，最可推許。本書雖以孫德勝為研究主題，但對共產革命和歷史記憶的研究者來說，仍有相當的參考意義。

註釋

① 斯大林：〈聯共（布）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〉，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：《斯大林全集》，第十卷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54），頁47。

② 陳輝燎（Tran Huy Lieu）著，范宏科、呂谷譯：《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》，第一卷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73），頁334。

③ William J. Duiker, *The Communist Road to Power in Vietnam* (Boulder: Westview Press, 1996), 139.

究竟武涯會議如何轉化為越共的宣傳工作任務？越共究竟是透過甚麼宣傳渠道，足以影響蘇聯和法共的視聽，以致連斯大林也接受黑海兵變的故事？這些都不是無關重要的問題，因為歷史記憶的政治操作是本書的宗旨所在。

黎漢基 廣東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副教授